

## 孙德谦及其诸子学

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 濂溪研究所, 湖南 永州 425100)

摘 要: 孙德谦为清末民初之际值得特别关注的学者之一。孙氏有见于政体之失, 而道体不可以失, 故而竭力延展旧学, 大治目录之学、实斋之学、诸子之学, 成就卓异。其学术根基皆自“笃信章实斋”而发, 治学谨于天人之道, 前后经历了所谓“谭道广平”时期和“海上三子”时期, 赖以开启民国一代之学术。

关 键 词: 孙德谦; 张尔田; 诸子学; 民国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2)05-0079-06

### Sun Deqian and his pre-Qin philosophies

ZHANG Jing-hua

(Lianxi Institut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006, China)

**Abstract:** Sun Deqian is one of the scholars who deserved special atten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period. He insisted that although the regime had perished, people could not discard their cultures. So he exerted all his efforts to inherit and develop traditions. He devoted his life to researching the bibliography, pre-Qin philosophers and Zhang Xuecheng's thought, and achieved great success. This article makes brief analysis on Sun's academic standings, his scholarly purposes, his achievements on pre-Qin philosophies and some other aspects as well.

**Key words:** Sun Deqian; Zhang Ertian; pre-Qin philosophies; republic academic history

孙德谦为清末民初学者, 平生治学以诸子学为归宿, 著述有《诸子要略》、《诸子通谊》、《诸子发微》、《诸子概论讲义》、《十家文编》、《诸子通考》内外篇等多种。王蘧常称“先生于学, 诸子最为专家, 造述独富”, 张尔田称“诸子之学, 创始益菴与弟”, 又称“自唐以后, 言诸子而能本于《汉志》者, 实自吾两人始”。而今人追论诸子学之兴起, 往往遗漏于清代与民国之间, 如郭齐勇、吴根友《中华文化通志·诸子学志》(1998)、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1998)、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2004)、宋洪兵《国学与近代诸子学的兴起》(2010), 皆无专论。似乎孙氏诸子学的学术史意义与胡适、钱穆、罗根泽以下诸家研究, 两相脱离, 前者既乏传承, 后者亦渐趋枝蔓。江璩、陈锺凡、罗竣、陈柱数家宗旨、义例与孙氏最近, 晚近则罕能振起, 总以不能回归本原, 故亦不能为世所重。

兹试加揭示, 抛砖引玉, 期有申论。

#### 一、孙德谦之学术立场

孙德谦先生, 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 卒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名德谦, 字受之, 又字寿芝, 号益菴, 晚号隘堪居士, 室号四益宦。

望文生义而揣测, 德谦之名当出于《易经》之《谦卦》, 与先生十九岁入县学时之学使王先谦字益吾命义相同。《易·谦·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 地道变盈而流谦, 鬼神害盈而福谦, 人道恶盈而好谦。”“受之”, 受益与福也。“益菴”, 承其所益也。“寿芝”取谐音, “隘”取同音, 读为“益”, “堪”即天道也。许慎注《淮南子》曰:“堪, 天道也; 舆, 地道也。”“宦”, 《尔雅》在《释宫》, “庵”类也, 而义通于《颐卦》, 谓天地颐养万物也。然而以“四益”阐发《谦卦》, 首推《汉志》。《汉志》称道家者流, “《易》之嗛嗛, 一谦而四益, 此其所长也”, 师古曰:“嗛字与谦同。”此即“四益宦”之出典。然则先生出生有此名, 晚年以此号, 其终

收稿日期: 2012 - 07 - 27

作者简介: 张京华(1962—), 男, 北京市人, 教授、濂溪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学术史。

生谨于天人之道，而以《汉志》为学术中坚，以发明六艺、九流之说而贡献于世，殆有天命然。

昔金源有人名孙德谦，元好问有诗题《赠别孙德谦》，称为“孙郎”。元亦有人名孙德谦，《新元史·忠义传》：“孙德谦，睢州人，官大同行省平章政事。大都既陷，惠宗北奔，明兵围大同。谦婴城固守，自知力不支，乃手书自决，作诗数章，词义激烈，饮药自杀。”按人有谦谨之德，而天道有时竟不能眷顾，乃至专以摧之残之灭之亡之，此司马所以质疑于“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古训也。《史记》一书，自本纪、世家、列传，十表、八书，未有深论天道者，而其自陈乃谓“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诚有之，“究天人之际”何谓也？庄生有言：“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天道与人道有时而相合，相合则可以无言；天道与人道有时而相分，相分则不胜其言。伯夷、叔齐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此则必有以论之，论此之谓“究天人之际”。

王蘧常所作《元和孙先生行状》载其感慨于金元二同名，又云：“时士媚凜说，视旧学若土埂，先生忧之。……当光绪之季，邪孽始萌，国步岌岌，先生自以诸生，无所补救，当(尝)辑陶渊明、二妙《年谱》、《杜善夫文集》、《金史艺文略》、《全金词》各若干卷，以寄其蕴愤之慨。……又读元诗选，见有同姓名官平章殉节者，元遗山诗亦有同者，能诗，皆遭末造，为心动，至作《三末谣》以见志。”<sup>[1]58-59</sup>先生《三末谣》诗云：“金未能诗寿不长，元末殉难官平章。及余而三又清末，不夭不节守其常。”夏敬观《忍古楼诗话》称孙德谦“其生平为诗绝少”，“视此亦可以知其生平抱负也”<sup>[2]22</sup>。

吾国学术传统特重天人之际，又重在鼎革兴替，尤对于叔世季世衰世末世，深怀痛悼。然而先生所关切者，又不仅在三末，盖金、元、清三朝，女真、蒙古、满人所建之朝也，而先生深情寄意焉。段克己、段成己兄弟“二妙”金人也。杜善夫，元人也。刘承幹曰：“先生于辛亥后，又辑有《金遗民录》，藏于家。”又发论曰：“完颜一代，地褊祚短，而亡国之后，遯庵、菊轩联袂高蹈，与夫野史

一亭殫心文献，空山掩泪，笙磬同音。其志事视《天地间集》、谷音汐社诸君子何以异？古人不作，来者难诬，岂有享国远过于金源，声教无间于南朔，而箕子仁贤，惟以陈疇为心，崔生高朗，不闻一士之报者哉？”<sup>[3]1</sup>是则先生所刳心，不只于寄情逸民，更在于夷夏之势。料先生必深知夫“学在四夷”之从权，“用夏变夷”之常道，惜未出其深论也。

《元和孙先生行状》又载：“辛亥(1911)，武昌军起，只身走海上”，“独居深念，几席常有涕泣处”<sup>[1]58-59</sup>。是年，先生作《南窗寄傲图记》，即以逸民自守。后数年，王国维作《百字令·题孙隘庵南窗寄傲图》云：“楚灵均后，数柴桑、第一伤心人物。招屈亭前千古水，流向浔阳百折。夷叔西陵，山阳下国，此恨那堪说。寂寥千载，有人同此伊郁？”

昔顾炎武为明诸生，而开有清一代学术。王蘧常作先生行状，亦以为可以“上之国史，以为修儒林、文苑传者要删，如《清史》之于亭林、南雷、船山先生焉，其可。”其意似以先生为清末诸生，而当赖以开启民国一代之学术。夫明人而开有清之学，清人而开民国之学，其可乎？其不可乎？

## 二、孙德谦之学术宗旨

有清之季今文盛，此康氏之今文也，以伪益伪，伪今文也；民国之初子学盛，此胡氏之子学也，以乱益乱，乱世之学也。析言破律，足以乱世淆听，而决不能终始条理，集成集美。

故自晚清民国以来，有学术，而学术与学术不同；有子学，而子学与子学不同。故先生尝为之慨言曰：“呜呼！今天下未尝废学也，庠序之内，莘莘学子所讲肄者，左行之文字，侏儻之语言，其甚者辞气鄙倍，曾子所戒，今且师弟之间公然传习。街谈巷议，不过小道之可观，而其推崇也，等诸金科玉律。一切经史之学，前贤所用以经世者，无不弁髦弃之。学术之衰，于斯为极。”<sup>[4]4-5</sup>

又曰：“呜呼！中国四部之书，至今日而若存若亡，将在无足轻重之列矣！慨自异说盛兴，为之士者，摈弃吾国旧有之学，所书者唯依卢左行之文，所习者为鲜卑通解之语，于是经可束阁，史可挂壁。更复造为文字，苟趋简易。出其诗歌则以谚言之，将古人文集皆可屏而不观。独于诸子尚有研阅之

者，然便辞巧说，一任我之所为而牵合傅会之，是其于诸子也，岂真能章明其学说哉？”<sup>[5]6-7</sup>

又曰：“呜呼！今天下之乱至矣，彼非圣无法者，日出其奇谬之学说，以隳弃纲常，划灭轨物。世风之愈趋而愈下，正不知伊于何底。”<sup>[6]4</sup>

又曰：“夫天下有治世之学术，有乱世之学术。余之表章诸子也，盖以百家学术皆以救时为主，世之乱也则当取而用之耳。”<sup>[7]43</sup>

故予以为近世经学当有分辨。奚乎辨？或以为“我辈生于今日，其任务则为结束经学”，又以为“经学时代已经结束了，可是经学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如此而自命为经学家者，伪经学也。子学亦当有辨。奚乎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尔田刊《史微内篇》(孙德谦《诸子要略》著作在先，然未刊行)，真子学也，民国六年(1917)胡适作《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伪子学也。陇头流水，其界分当如此。

张尔田《史微·凡例》曰：“《史微》之为书也，盖为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而作也。……名曰《史微》者，以六艺皆古史，而诸子又史之支与流裔也。”

<sup>[8]1</sup> 王国维称张尔田《史微》云：“君之学固自浙西入，而渐渍于浙东者，故曩为《史微》，以史法治经、子二学，四通六辟，多发前人所未发。”<sup>[9]3</sup> 钱基博谓章学嗣响，“又一衍而为钱唐张尔田孟劬、元和孙德谦隘堪。尔田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派，著《史微内篇》八卷，以丕扬章氏‘六经皆史’之义。而德谦则为《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讎学纂微》两书，以论定讎例，又著《太史公书义法》二卷，以究明史意。”<sup>[10]68</sup>

孙德谦卒，张尔田为论定学术宗旨，有云：“诸子之学，创始益莽与弟，而执事实为之后劲。世有表子学先河者，必不遗我辈，此固非区区标榜之谓耳。”<sup>[11]90</sup>

又云：“诸子之学，绝千余年，国朝儒者非无治之者，然大抵皆校勘家，非子学也。两人本笃信章实斋，习于《流略》，遂于《汉艺文志》发悟创通，自唐以后，言诸子而能本于《汉志》者，实自吾两人始。尝自诩其功，不在戴东原发明《孟子》字义之下。即有欲推翻吾两人者，亦必先推翻《汉志》不可，《汉志》苟推翻，则中国学术且尽亡。

苟其为中国人、有人心也者，必不灭裂至此。吾两人现见及此，于是用《汉志》创通诸子。益莽先成《诸子要略》，仆亦成《史微内篇》，益莽复又成《通考》三卷。于王念孙辈校勘训诂外，别辟一门径矣。虽近十年来，诸子之学日异而月不同，我辈自亦不免有积薪之叹，然先河后海之功，似亦不容没也。”<sup>[12]91</sup>

王遽常《元和孙先生行状》称孙德谦：“于清儒独契会稽章实斋言，习于《流略》，遂于《汉志》发悟创通。章氏严于体例，而先生则钩索质论，贯殊析同，直欲驾而上之矣。又叹世之讲板本者，得宋元以矜奇闕，而于书之义理则非所知。以为刘氏向歆之所长只此璅璅辨订于字句之间，未能条其篇目，撮其指归，于是又治向歆父子之学。盖生平得力在周秦名家之术，于一切学问异同咸思礲实以求其真，其后虽屡进而益深，皆植基于此矣。兴化李审言明经详，尝称先生会稽之学与太守(张尔田)为海内两雄，有益一人不得者，犹未能尽先生之学也。三十以后，尝欲遍注诸子，精思真索，往往搢擢肾胃而出之。”<sup>[1]58</sup>

孙氏尝自言为“章氏学派”<sup>[13]68</sup>，而沈增植亦称之为“今之章实斋”<sup>[14]94</sup>。予按晚清民国以来诸子之学，以孙德谦、张尔田开其先，刘师培、江璩、刘咸忻承其后，具有宗旨。(此下陈柱、陈鍾凡、王遽常诸人，精粗不一，亦多辟见)此五人俱皆私淑实斋，实可厘为一部实斋学案。其学术始基，皆自“笃信章实斋”而发。盖信章实斋乃能信刘向歆父子，乃能信《汉志》、信《诸子略》，乃能信《周官经》，由此而尊崇三代，下览四部，故治经学而经学立，治子学而子学立，治国学而国学立。

张尔田卒，邓之诚复为论定学术宗旨云：“所撰《史微》八卷，本章学诚之旨，求证于群经诸子，穷源竟委，合异析同，以推古作者之意。……早岁愤梁启超辈异说惑世，因撰《新学商兑》一卷。晚尤笃信孔孟，有犯之者，大声急呼以斥之，虽亲旧无稍假借。谓人心败坏至此，必有沧海横流之祸。”又云：“世安有不信其人，而其学可信者哉？今之自命学人者多矣，攘臂争利，鬼怪百出，此世之所以乱也。”<sup>[15]323-325</sup>

由此而言，可知笃信其人，笃信其学，因以考

求上古之本真,是为真子学;虽岌岌于诸子学科之设置,其实不信其学,仅利用之以成一己之私情,故不惜钩钅割裂,破碎其义,是即伪子学。真伪之际,由信与不信可见其一端矣。

### 三、孙德谦之学术转变

孙德谦与张尔田治学,有所谓“谭道广平”时期与“海上三子”时期。

张尔田《史微·凡例》云:“往与吾友孙君益菴同谭道广平,即苦阮氏、王氏所汇刊《经解》琐屑短钉,无当宏旨,嗣得章实斋先生《通义》,服膺之。”为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所作《序》又云:“与余同读书广平,举向之声韵训诂,尽弃其所学,而一以会稽章氏为归。”

据《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孙德谦二十岁,“大治目录学”,辑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等十三卷,“名之曰《古书录辑存》”。次年,“成《汉志艺文略》一卷”。<sup>[16]93-94</sup>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孙德谦二十九岁,至元城课业张东荪,即张尔田之弟。时张上龢(字沚蓴,《年谱》作芷蓴,《行状》作芷纯)为元城县令,即张尔田之父。

张上龢“由元城改静海,后又调广平府永年县”,孙德谦“皆从之”,张尔田“亦时时省亲至署”。<sup>[12]91</sup>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孙德谦三十岁,在静海,“于经、小学自艾不得大义,为高邮一派徒屑屑于章句,非其至,遂去经而专治百家言”<sup>[16]95</sup>。

二十五年己亥(1899),孙德谦三十一岁,在广平永年,“其年与孟劬太守同治会稽章实斋书,始以(张)章氏治史之法治诸子。‘凡先秦诸子之书,罔不(鞫)察(鞫)理,疏(鞫)比(比)昔,必(鞫)于至(鞫)而(鞫)无(鞫)蔽’,而子学乃大进”<sup>[16]96</sup>。

张尔田《与陈柱尊教授悼孙益菴教授书·第三书》亦云:“是年始同读章实斋书,两人者始尽弃从前训诂章句之学,潜研乙部,拙著《史微》所谓‘谭道广平’者此也。”

此为“谭道广平”时期。

张尔田《与陈柱尊教授悼孙益菴教授书·第三书》:“时王静安亦来沪,仆因介与隘菴相见,三人

者遂相视莫逆,培老(沈增植)诗所谓‘三客一时隼吴会,百家九部共然疑’者,指吾三人也。”又曰:“此仆与益菴遇合之迹也,尝综合吾两人之生平、学行、志趣,殆无弗同。”

王国维云:“丙辰(1916)春,予自日本归上海,卜居松江之侧,闭户读书,辄兼旬不出,所从谈学问者,除一二老辈外,同辈惟钱唐张君孟劬,又从孟劬交元和孙君隘庵,二君所居距予居不数百步,后遂时相过从。二君为学皆得法与会稽章实斋先生,读书综大略,不为章句破碎之学。孟劬有《史微》,隘庵有《诸子通考》,既藉甚学者间,丁巳秋,隘庵复出所撰《汉书艺文志举例》。”<sup>[17]1</sup>

夏定域曰:“嘉兴沈子培(曾植)曾称先生为‘今之郑夹漈’,更以先生与张尔田及海宁王静安(国维)并称,谥曰‘三君’,曾有‘三客一时萃吴会,百家九部共然疑’之诗句,其推崇可谓至矣。”<sup>[18]3</sup>

邓之诚《张君孟劬别传》谓张尔田“居上海时,与海宁王国维、吴孙德谦齐名交好,时人目为‘海上三子’”<sup>[15]324</sup>。

此为“海上三子”(又称“海上三君”)时期。

王国维治学由西学而自返,专意诗词、戏曲,于经学、孔学殊不屑屑。其后粹精于甲骨金文,又专注于所谓“史料”,其学术途径实较复杂,与孙德谦、张尔田二人大同之中又有小异,当别作专论。

### 四、孙德谦之子学成就

孙德谦于诸子学,所著述有《诸子要略》、《诸子通谊》、《诸子概论讲义》、《十家文编》,及《诸子通考》内外篇等。

《诸子要略》又称《诸子辑略》,共五十篇,未见刊行,单篇《家数》、《宗旨》二篇见《亚洲学术杂志》1922年第1卷第1期、第2期。

《诸子通谊》又称《子通》,《诸子通考》卷二引《十家文编·自序》云:“尝撰《子通》一书,挈其纲矩,复句古人异论,而著《诸子通考》矣。”今见《荀子通谊》,孙氏卒后,于《学海月刊》创刊号、第1卷第5册连载。又有《吕氏春秋通谊》,未见。又有《墨子通谊》、《列子通谊》、《贾子新书通谊》,皆未成稿。

又著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国文科《诸子概论讲

义》一小册，分《诸子须辨明家数》、《诸子各有其宗旨》、《诸子之派别》、《诸子之寓言》、《诸子本书及未流之失》等七章。

《十家文编》为诸子文选，其书未见。《自序》曰：“《六经》而后，奇文郁起，其诸子哉！”“夫祖述唐虞，留思仁义，儒家文也；鉴观成败，秉执撝谦，道家文也；循声责实，尊君卑臣，法家文也；历说权宜，熄兵弭患，从横家文也。”又曰：“今者萃兹十家，都为一集。”“暝钞听写，提要钩元。”

《诸子通考》内篇三卷，宣统二年庚戌(1910)由江苏存古学堂刊行。江苏存古学堂仿张之洞武昌存古学堂而设，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孙德谦与张尔田共请创设，孙氏并任协教，讲授诸子之学三年。

其书线装铅印，1函3册。题“元和孙德谦益菴父撰”，朱祖谋书检，为《四益宦丛书》之一。卷下题“四益宦丛书”。按“四益宦”，民国七年《汉志艺文志举例》刻本、民国十二年《刘向校讎学纂微》、《六朝丽指》刻本，民国十五年《太史公书义法》刻本，即《孙隘堪所著书》四种，均题作“四益宦”。

《诸子通考》外篇未刊，上海图书馆存有稿本。

王遽常《元和孙先生行状》云：“先生于学，诸子最为专家，造述独富。尝谓诸子于古为绝学，两汉以还渺有涉其籀者，后儒且加倍击，即有识者亦识其文字而已。欲为之洒冤解惑(“洒”即“洗”之本字，见《说文》)，一发千年来之积藪。其疏释闕旨者为《通谊》，其剽剥古贤者为《通考》，其辨章同异者为《要略》。又取《晏子》而下，在一篇之中挈其巨纲、阐其大谊者为《发微》，而综其指于《通考》之《序》。”<sup>[1]59</sup>疑《诸子发微》即《诸子通考》内篇，“《晏子》”或为“《庄子》”之误。而所云“剽剥古贤者为《通考》”为《诸子通考》之外篇，内外篇尝分别为二书。

孙德谦《庄子通考·内篇·序》云：“于是取《汉志》所载、为今所未亡者，若荀、吕诸书，发明其一家之言，而究其大义。复为提挈纲要，别立篇目，作《要略》一书……以总论者入《内篇》，专论者入《外篇》。”所云“荀、吕诸书”“究其大义”，即《诸子通谊》。所云“总论”、“专论”，似内外篇体例颇有差异。然就《内篇》而言，其书篇

题标作“诸子通考卷一”、“卷二”、“卷三”，题下均标“内篇”，书口标作“考一”、“考二”、“考三”，似《外篇》当接续作卷四起，内外篇合为一体。

传世又有《孙益菴诸子考内篇残藁》抄本，钤“益菴”朱文方印，内有《孟子》及《孔丛子》“子思年十六”、“孟轲问子思”等节。体例与刊本《诸子通考》内篇相近，而内容不见于今本，疑为未定之稿。

其书无目录，以历代有关于序录者为经，顶格排。取历代相关议论为“附录”，低一格排。皆加以案断，标为“谦案”，低二格排，如经传。间有双行小字夹注。其体例可谓自为经传，原委清晰，虽“条理略逊”(胡适语)，然自无妨于迭出精义。计卷一考《庄子·天下篇》、《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太史谈《论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篇》、《史记·孟荀列传》七篇，卷二考《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史记·管晏列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葛洪《抱朴子·百家篇》、刘昼《新论·九流篇》、《隋书·经籍志》、《文心雕龙·诸子篇》、韩滉《涧泉日记》、庄元臣《叔苴子·内篇》、焦竑《笔乘》、文震孟《诸子汇函》十一篇，卷三考《汉志·诸子略·儒家者流》、《汉志·诸子略·道家者流》、《汉志·诸子略·法家者流》三篇，共二十一篇。

王遽常谓“综其指于《通考》之《序》”，《元和孙先生行状》大段引之，其说是也。

今读其《序》，所言凡有八义。《序》之首数句云：“《诸子通考》内外篇，为古人洗冤、来学辨惑而作也”，第一义。“夫诸子为专家之业”，第二义。“其人则皆思以拯世”，第三义。“其言则无悖于经教”，第四义。“读其书者要在尚论其世”，第五义。“又贵审乎所处之时”，第六义。“而求其有用”，第七义。“苟不知此数者，徒疏释其章句，诤品其文辞，甚或爱之则附于儒术，憎之则摈为异端，此丙部之学所以埋晦不明，受诬于千载，无有为之表章者也”，第八义。<sup>[7]1</sup>以下即次第疏解之(即太史谈《论六家要指》之法)。按此八义即孙氏《通考》内外篇宗旨，亦即孙氏治诸子学之宗旨。

张上龢于元城诗赠孙德谦，有云：“古史无文苑，中垒九流析。不有周秦子，谁能继六籍。”<sup>[16]96</sup>

要之,经之与子,成则两成,毁则两毁。经子互证,源流互通,首尾两立而不割裂,是为得之。

#### 参考文献:

- [1] 王蘧常.元和孙先生行状[J].国专月刊,1935,2(4):58-59.
- [2] 夏敬观.忍古楼诗话[M].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3册[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3] 刘承幹.二妙年谱·序[C]//孙德谦.二妙年谱.民国求恕斋刻本.
- [4] 孙德谦.儒家道术于四时属夏故其教重学而明礼说[J].亚洲学术杂志,1922,1(4):4-5.
- [5] 孙德谦.中国四部书闡原[J].亚洲学术杂志,1922,1(2):6-7.
- [6] 孙德谦.评今之治国学者[J].学衡,1923(23):4.
- [7] 孙德谦.诸子通考内篇[M].清宣统二年江苏存古学堂排印本.
- [8] 张尔田.史微[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 [9] 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C]//张尔田.玉溪生诗年谱会笺.民国求恕斋刻本.
- [10] 钱基博.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M].上海:中山书局,1929.
- [11] 张尔田.与陈柱尊教授悼孙益菴教授书·第二书[J].学术世界,1935,1(8):90.
- [12] 张尔田.与陈柱尊教授悼孙益菴教授书·第三书[J].学术世界,1935,1(8):91.
- [13] 孙德谦.论国学分类方法[J].大夏周报,1933,9(28):86.
- [14] 孙德谦.跋陈柱尊所藏沈子培先生与康长素手札[J].学术世界,1936,1(8):94.
- [15] 邓之诚.张君孟劬别传[J].燕京学报,1946(30):323-325.
- [16] 吴丕绩.孙隘堪年谱初编[J].学海月刊,1944,1(1):93-96.
- [17] 王国维.汉书艺文志举例·序[C]//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民国四益宦刻本.
- [18] 夏定域.悼孙德谦先生[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5,4(6):3.

责任编辑:曾凡盛

(上接第78页)

#### 参考文献:

- [1] 朱自振.宋元茶业的发展和变革[EB/OL].中国茶史.拙风文化网. <http://www.wenhua.cn/chadao/chashi/105.htm>, 2012-09-23.
- [2] 朱自振.中国茶业历史概略(续)[J].农业考古,1994(4):179-186.
- [3] 张永仟.明代江南与日本的待客茶俗之比较研究——以一位日本遣明使的所见为中心[J].农业考古,2007(6):182-185.
- [4] 陈植.长物志校注[M].南京:江苏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406.
- [5] 陈功.中国的茶礼俗[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2(1):106-110.
- [6] 周慧.茶礼形成原因述论[J].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学报,2006,23(6):88-90.
- [7] 郭孟良.明代茶叶生产的发展[J].殷都学刊,2000(2):31-35.
- [8] 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中国古代茶叶全书[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209-275.
- [9] 王秀萍.明清茶美学思想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 [10] 袁枚.随园食单[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178.
- [11] 章传政,朱自振,黎星辉.明清的茶书及其历史价值[J].古今农业,2006(3):66-71.
- [12] 陈祖集,朱白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1:151,141.
- [13] 郭孟良.中国古代茶典[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2.
- [14] 郭孟良.中国茶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130.
- [15] 施由民.论中国茶文化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J].农业考古,2007(2):15-21.

责任编辑:曾凡盛